



列 寧

論“左派”幼稚性和
小資产階級性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論“左派”幼稚性和 小資產階級性

馬克思 恩格斯 著作
中共中央 列 宁 斯大林 編譯局譯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В. И. ЛЕНИН
О «ЛЕВОМ» РЕВЯЧЕСТВЕ И О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ОСТИ
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中的俄文排印

列 宁
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产階級性
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編譯局譯
列 宁 編 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豐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1 · 字數 22,000

1963年4月第1版
196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3,059 定價（冊）0.15元
統一書號 1601·553

“左派共产主义者”小集团的刊物“共产主义者”^①（1918年4月20日第1期）和他們的“提綱”的出版，最有力地证实了我在“关于苏維埃政权的当前任务”^②那本小册子里所談到的情况。那种有时隐藏在“左的”口号下面来拥护小資产階級放蕩行为的全部幼稚性，在政治著作中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明显的证实了。研究“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議論，是有益的和有必要的，因为这些議論說明了目前形势的特点；它們从消极方面非常明显地指明了目前形势的“关键”；它們是有教育意义的，因为在我們面前的是些比較好的人，他們虽然不了解形势，但是在知識方面和忠实方面，却远远超过那些犯有同样錯誤的平庸之輩——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

“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以政治——或想起政治作用的——团体的資格，向我們提出了他們的“目前形势的提綱”。把自己的观点和策略的基本原則連貫地完整地闡述出来，这是馬克思主义的好习惯。这种馬克思主义的好习惯，有助于揭露我們的“左派”的錯誤，因为单是企图辯解，——而不是振振有詞地說明，——就已經揭露出这种辯解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关于結紮布列斯特和約是否正确这个

① 見“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7卷第216—255頁。——編者注

老問題的种种示意、暗語和遁辭。“左派”不敢直接提出這個問題，只是滑稽可笑地東拉西扯，堆砌論據，挖空心思硬造理由，搜索各種“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他們涉及一切問題，但力求不看見這些問題是怎樣互相矛盾。在黨代表大會上有12票反對和約，有28票贊成和約，這個數字，“左派”很殷勤地引用着，但是對於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黨團內的好幾百票中，他們得到的票數還不到 $\frac{1}{10}$ 這個事實，他們却謙遜地默不作聲。他們製造一種“理論”，說贊成和約的只是些“疲憊的、喪失了階級性的人們”，而反對和約的“則是經濟上比較有生氣和糧食比較有保證的南部地區的工人和農民”……這種說法，如何不令人發笑？他們對全烏克蘭蘇維埃代表大會贊成和約的表決情況一聲不響，對過去反對和約的、俄國的典型小資產階級的和喪失階級性的政治集團（左派社會革命黨）的社會性和階級性只字不提。這是十足幼稚的騙人伎倆，想用可笑的“有科學根據的”解釋，來掩蓋自己的破產，來蒙蔽事實；然而只要把這些事實約略敘述一下，就足以表明：用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空談的口號來反對和約的，正是一些喪失階級性的、黨內知識分子的“頂峰”和上層分子，而贊成和約的則正是工人和被剝削的農民群眾。

儘管“左派”在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上作了上述一切聲明和遁辭，但是簡單而明顯的真理卻還是在給自己開辟前進的道路。該提綱的作者不得不承認：“和約的簽訂暫時削弱了帝國主義者進行國際勾結的企圖”（“左派”的這種說法還不夠確切，不過在這裡用不着來研究這些不確切的地方）。“和約的簽訂，已經使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搏鬥更加緊張了。”

這就是事實。這就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此，當時反對簽訂和約的人，在客觀上就受到帝國主義者的玩弄，上了他們的圈套。

要知道，在包括儿国的、其强力足以战胜 国际帝国主义的 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以前，已經在一个国家中（尤其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中）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者的根本使命，就是 不要同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战斗，要竭力避免战斗，要等待时机，使帝国主义者相互間的搏斗 更加削弱他們自己的力量，并且促使其他各国的革命更加迫近。我們的“左派”在 1、2、3 月間，沒有懂得这个简单的真理，就是現在，他們还是不敢公开承认这个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却不顾他們的一切混乱而給自己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他們的混乱就是：“一方面不能不意識到，另一方面應該承认”。

“左派”在自己的提綱中写道：“在即将到来的春季和夏季里，帝国主义体系必定会开始崩潰，即令德国帝国主义贏得当前战局的胜利，也只能使这个崩潰延緩一下，但是結果它将表现得更加剧烈。”

尽管竭力玩弄科学态度，但这种說法更加幼稚和錯誤了。孩子們是这样来“理解”科学的：似乎科学能够断定在哪一年內，在春季和夏季或秋季和冬季里，“必定”“开始崩潰”。

想知道无法知道的事情，那是可笑的行为。任何一个庄重的政治家决不会說：“体系”在什么时候“必定开始”某种崩潰（况且这个体系已經开始崩潰，而問題是在于各个別国家內爆发的时机）。但是，无可爭辯的真理却不顾这种幼稚得可怜的说法而給自己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因为和約簽訂以后开始的“喘息”时机已經过了一个月，而其他比較先进国家的革命的爆发，已經比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以前 更加迫近 我們了。

这表明什么呢？

这表明，拥护和約的人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历史已經証明他們是正确的，他們曾向那些崇尚浮夸的人指出：必須善于估計力量的

对比，不要帮助 帝国主义者，不要在社会主义力量还薄弱的时候，在战斗时机显然 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时候，使帝国主义者易于同社会主义作战。

但是，我們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們也爱自称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其实他們特別缺乏无产阶级的的气味，而特別富有小资产阶级的的气味，——却不善于考虑力量的对比，不善于估计力量的对比。馬克思主义和馬克思主义策略的关键就在这里，而“左派”却看不见这个“关键”，只是“傲慢地”說着一些空話，例如：

“……不振作的‘和平心理’在群众中深深地扎起根来了，这是政治形势方面的客观事实……”

这真是奇談妙論！經過三年最痛苦最反动的战争以后，由于有了苏維埃政权及其正确的不沉醉于空談的策略，人民得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十分小的、不巩固的和很不充分的喘息的机会，而自命不凡的“左派”知識分子却煞有介事地說：“不振作的(!!!???)和平心理在群众中(???)深深地扎起根来了(!!!)。”我在党代表大会上說过，“左派”的报纸或杂志不应该叫做“共产主义者”，而应该称为“小贵族”^①，我这种說法难道不正确嗎？

一个稍微懂得被剥削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和心理的共产主义者，难道可以采取丧失阶级性的、充滿小贵族情緒的、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識分子的观点，說“和平心理”是“不振作的”，而认为揮舞紙劍倒是“奋发有为”？其实我們的“左派”正是在揮舞紙劍，他們抹杀人所共知的并且为乌克兰战争所再度证明了的事实：受了3年战争痛苦的人民，如果得不到喘息的机会，就不能繼續作战；如果无力在全国范圍內組織战争，則战争所能引起的往往是小私有者的涣散的心理，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铁的紀律的心理。我們在“共

^① 見“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7卷第93頁。——編者注

产主义者”杂志上到处都可以看出：我們的“左派”根本不懂得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以及如何培养这种纪律，他们浸透了丧失阶级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

二

但是，也许“左派”关于战争的空话不过是一种幼稚的热情，而且事关过去，因此并没有丝毫政治意义吧？有些人这样为我們的“左派”辩护。但这是不对的。如果想自居于政治领导地位，就要善于周密地考虑政治任务，而“左派”因为没有这种能力，所以就变成一些毫无定见的东摇西摆的说教者，这在客观上就只有一个意义：“左派”以自己的摇摆不定帮助帝国主义者唆使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去投入对它显然不利的战斗，帮助帝国主义者把我们拖下陷阱。请听吧：

“……俄国工人革命如果离开世界革命的道路，不断地避免战斗，对国际资本的进攻实行退却，向‘本国资本’让步，它就不能‘保全自己’。

从这个观点出发，必须采取坚决的、阶级的、国际的政策，用言论和行动来配合国际的革命宣传，并且必须加强同国际社会主义（而不是同国际资产阶级）的有机联系……”

关于这一段文字里对国内政策方面所作的攻击，我将在后面另外来谈。现在请看看对外政策方面的这种口头上的放肆以及实际上的胆怯吧。目前每一个不愿意做帝国主义挑拨工具和不愿意堕入陷阱的人，应该执行什么策略呢？每个政治家都应当明确地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我党的回答是众所周知的：目前应当退却，应当避免战斗。我們的“左派”不敢作相反的回答，却来放空炮：“坚决的、阶级的、国际的政策”！！

这是欺騙群众。如果想現在作战，就請直說吧。如果不願意現在退却，就請直說吧。否則，就你們的客观作用來說，你們就是帝国主义挑撥的工具。而你們的主觀“心理”就是狂暴的小資產者的心理，这种小資產者尽管自充好汉，虛張声势，但深深地感觉到：无产者实行退却并力求有組織地退却，是正确的；无产者估計到在沒有力量的时候應該（在西方和东方帝国主义面前）退却，甚至退到烏拉尔一带，这是正确的，因为在西方革命正在成熟的时期中，这是取得胜利的 唯一 希望，虽然这个革命不是“必定”（与“左派”的空談相反）在“春季或夏季”开始，但是它一月比一月 更加临近，更加肯定。

“左派”沒有“自己的”政策；他們不敢宣布現在退却是不必要的。他們翻來復去，玩弄字眼，拿“不断”避免战斗的問題偷偷地代替目前避免战斗的問題。他們光是吹肥皂泡：“用实际行动来配合国际的革命宣傳”！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只能意味着下面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情况：或者是諾茲德烈夫习气，或者是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为目的的攻击战。这种胡說不能公开讲出来，所以“左派”共产主义者不能不用最响亮最空洞的詞句来作掩护，借以避免一切有觉悟的无产者譏笑他們；他們以为，粗心的讀者也許看不出“用实际行动来配合国际的革命宣傳”这句话的真正意义。

夸夸其談，这是喪失階級性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特性。有組織的无产階級的共产主义者，对于有这种“习气”的人，一定要給以懲罰，至少要加以譏諷和撤銷其一切負責职务。應該簡單、明白、直接地向群众讲明这个痛苦的事实：主战派在德国又会占上风（就是說会立刻轉而向我們进攻），德国和日本将根据正式協定或默契共同来瓜分我們，扼死我們，这是可能的，而且是很可能的。

如果我們不願意听从空喊的人們，那末我們的策略就是：靜候、拖延、避免战斗、退却。如果我們丟开空喊的人們，并且“振奋起来”，建立真正铁的、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共产主义的紀律，那末我們就真可能赢得好几个月的时间。那时，就是退到了烏拉尔(这是最坏最坏的情况)，我們也能使我們的同盟者(国际无产阶级)更加有可能前来援助我們，更加有可能“越过”(用体育用語来讲)从許多革命爆发的开始到实行革命之間的距离。

实际上，这样的策略，也只有这样的策略，才能加强国际社会主义的一个暂时处于孤立地位的队伍与其余队伍間的联系；而你們呢，亲爱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老实說，你們只是“加强”一个响亮詞句与另一个响亮詞句間的“有机联系”。这是一种很不好的“有机联系”啊！

亲爱的朋友們，我来給你們解釋，为什么你們会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这是因为你們对于革命口号背誦得多，死記得多，而思索得却很少。因此你們把“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这句话加上引号，大概想借此来表示你們的諷刺，但实际上这个引号正表示出你們的思想一塌糊塗。你們慣于把“护国主义”看做卑鄙齷齪的东西，你們背熟了这一点，你們把这一点背得烂熟，以致你們中間有些人竟弄到荒謬地步，以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保卫祖国是不能容忍的(实际上，只是在资产阶级所进行的帝国主义的、反动的战争中，保卫祖国才是不能容忍的)。但是你們沒有很好考虑：“护国主义”为什么是并且在什么时候才是齷齪的。

承认保卫祖国，就是承认战争的正当性和正义性。从什么观点出发来看这种正当性和正义性呢？只有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及共爭取自己解放的观点出发；其他的观点，我們是不承认的。如果是剝削者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阶级統治而进行战争，这就是罪恶

的战争，这种战争中的“护国主义”就是卑鄙行为，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如果是已经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而进行战争，那末这种战争就是正当的和“神圣的”。

我们是1917年10月25日以后的护国派。我曾十分明确地一再讲过这一点，你们也不敢反驳这一点。正是为了“加强”同国际社会主义的“联系”，就必须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谁要是对于无产阶级已经获得胜利的国家的国防采取轻率的态度，他就是在破坏同国际社会主义的联系。在我们还是被压迫阶级的代表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轻率地对待过帝国主义战争中的保卫祖国的問題，我们从原则上否认了这种保卫。当我们已成为开始组织社会主义的统治阶级的代表时，我们就要求一切人严肃地对待国防。严肃地对待国防，这就是说要切实准备并精确地估计力量的对比。如果力量显然不够，那末最重要的防卫手段就是退入腹地（谁要是认为这只是临时做出来应急的牵强附会的公式，那末，他可以去读一读克劳塞维茨²这个老头子——伟大的军事著作家之一——关于这一点的历史教训的总结）。可是“左派共产主义者”丝毫也不像是懂得力量对比这个问题的意义。

过去，我们在原则上反对护国主义，所以我们当时有权利讥笑那些好像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而想“保护”自己祖国的人。现在，我们已经获得做无产阶级护国派的权利，因此，问题的整个提法就根本改变了。我们的责任就是最慎重地估计力量，最仔细地衡量我们的同盟者（国际无产阶级）是否来得及帮助我们。资本的利盆，就是要在全世界的工人还没有联合起来（实际上就是开始革命）以前，把敌人（革命的无产阶级）各个击破。我们的利盆，就是要尽一切可能，利用甚至是最小的机会，使决战推迟到整个伟大的国际军队的各个革命部队实现这种联合的时候（或者推迟到实现

这种联合‘以后’)。

三

現在我們來談談我們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在國內政策方面的厄運。我們讀到他們目前形勢的提綱中的這類詞句，實在會不禁失笑：

“……只有實行最堅決的社會化，才能有計劃地利用現存的生产資料”……“不是向資產階級及其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走卒投降，而是要完全打倒資產階級和徹底粉碎怠工……”

親愛的“左派共產主義者”，他們的堅決性那麼多……而思考力卻那麼少！所謂“最堅決的社會化”，這是什麼意思呢？

在國有化問題和沒收問題上，可以有堅決的或者是不堅決的態度。關鍵卻在於：要由國有化和沒收過渡到社會化，即使有世界上最大的“堅決性”，也是不夠的。我們的“左派”的不幸，就在於當他們天真地、幼稚地把“最堅決的……社會化”這些字眼聯在一起的時候，就暴露出他們對問題的關鍵完全無知，對“目前”形勢的關鍵完全無知。“左派”的厄運，就在於他們沒有看到“目前形勢”的實質，沒有看到由沒收（在實行沒收時，政治家的主要品質就是堅決性）到社會化（要實行社會化，就要求革命家有另一種品質）的過渡的實質。

昨天，目前形勢的關鍵在於：盡量堅決地實行國有化，實行沒收，打倒資產階級，粉碎怠工。今天，只有盲人才看不到，我們已經國有化的，已經沒收的，已經打倒的和粉碎的，要比我們已經來得及加以統計的要多。可是社會化和簡單的沒收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實行沒收可以只有一個“堅決性”，用不着有正確統計和正確分配的才能，而實行社會化，就不能沒有這種才能。

我們的历史功績，就是昨天(明天也会如此)在实行沒收方面，在打倒資產階級和粉碎怠工方面，我們是坚决的。如果今天把这一点写入“目前形势的提綱”，就等于面向过去和不懂得向将来过渡。

“……彻底粉碎怠工……”他們终于找到了任务！但是我們这里的怠工現象已經完全“粉碎”了。我們所不够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即：进行統計，計算一下應該把哪些怠工者安插到哪些地方去，怎样組織自己的力量去施行監督，譬如說，使一个布尔什維克領導者或監督者，去監督一百个為我們服务的怠工者。在这种情况下，乱叫什么“最坚决的社会化”、“完全打倒”、“彻底粉碎”，就是胡說八道。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特点就是不知道打倒、粉碎等等手段对于社会主义是不够的，——只有瘋狂反对大私有者的小私有者，才认为这就够了，——但是无產階級革命家，無論什么时候都不会犯这种錯誤。

如果我們上面所引的話会使人失笑，那末“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新发现就簡直会使人捧腹大笑了。按照他們的說法，在“右派布尔什維克傾向”之下，苏維埃共和国有“向国家資本主义方面发展”的危險。你看，他們可真正把人吓倒了！因此“左派共产主义者”十分热心地在自己的提綱中，在自己的論文中，再三重复着这一駭人听聞的发现……

但是他們从沒有想过，国家資本主义較之我們苏維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資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終地巩固起来，立于不败之地。

我暗自揣度，“左派共产主义者”会怎样义憤填膺地来摺斥这些話，他們将在工人面前給予“右派布尔什維克傾向”以何等“致命的批評”。怎么？在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向国家資本主义

过渡竟会是一个进步？…… 这岂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嗎？

“左派共产主义者”在經濟問題上的 錯誤的根源就在这里。因此，对于这一点，我們就應該更詳細地研究一下。

第一，“左派共产主义者”不了解：这个使我們有权利、有根据自称为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由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究竟是怎样的。

第二，正因为他們 看不到 小資產階級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所以他們就暴露了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性。

第三，他們拿出“国家資本主义”这个名詞来吓人，这就暴露出他們不了解在經濟上与資產階級国家迥然不同的苏維埃国家。

我們来研究一下这三种情况。

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經濟問題的人否认过这种經濟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維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认为新的經濟制度是社会主义的。

那末过渡这个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在經濟上是不是說，在这制度內 既有 資本主义的 也有 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誰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現有各种社会經濟結構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問題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

現在我們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不：

- (1) 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經濟；
- (2) 小商品生产(这里是指大多数的出卖粮食的农民)；
- (3) 私人資本主义；
- (4) 国家資本主义；
- (5) 社会主义。

俄国如此辽阔广大，如此五光十色，以致社会经济结构的所有这些不同类型都错综在它里面。特点就在这里。

試問，占优势的究竟是哪些成分呢？显然，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的，而且也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因为大部分甚至极大部分的种地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我国的投机商人时时彼地在破坏国家资本主义（粮食壟断，受国家监督的企业主和商人，办合作社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外壳，而投机活动的主要对象，便是粮食。

主要的斗争正是在这方面开展着。如果用“国家资本主义”之类的经济分类术语来说，究竟是誰和誰进行这一斗争呢？是（按我刚才列举的次序）第四种成分和第五种成分作斗争嗎？当然不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共同一致地既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抗拒国家的任何干涉、统计与监督，不論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或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这是絲毫不容争辩的事实，经济問題上“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錯誤都是由于不了解这一事实才发生的。投机者、奸商、壟断制破坏者——这就是我国“内部的”主要敌人，即苏维埃政权在经济措施方面的敌人。如果說在一百二十五年以前，法国小资产者这些最突出、最真诚的革命家想通过絞杀个别几个“要犯”和頒布大批文告来战胜投机商这种願望当时尚可原諒的話，那末現在，某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这个問題还要采取純空談的态度，就只能引起每个有觉悟的革命者的憎恶或厌棄了。我們非常明白，投机活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俄国境内特別广泛的小私有者阶层，以及在每一个小资产者那里都有自己代理人的私人资本主义。我們知道，这种小资产阶级多头蛇的千百万触角，时时彼地纏住了工人中的个别阶层，使投机活动得以钻入我国社会經

济生活的所有毛孔中，从而 排除国家壟断制。

誰要是看不到这一点， 那他就恰恰由于盲目无知而暴露出自己做了小资产階偏見的俘虏。我們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就是这样的，他們在口头上（当然，他們的最真誠的信念也是如此）是小资产階級的无情的敌人，而在实际上，却只是帮助小资产階級，只是为小资产階級效劳，只是表現小资产階級的观点，因為他們要——在 1918 年 4 月 11——反对……“国家資本主义”！真是胡鬧！

小资产者拥有在战时用“正当”办法，特别是用不正当办法积累起来的几千几千的小款。这种典型的經濟式样也就是投机活动和私人資本主义的基础。金錢是表明取得了社会財富的证物，千百万小私有者紧紧地握住这个证物，把它瞞过“国家”的耳目，不相信任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心想“躲过”无产階級的風暴。或者是我們使这些小资产者服从我們的 监督和統計（若把貧民，即把多数居民或半无产者組織在有觉悟的无产階級先鋒队的 周围，那我們便能做到这点），或者是这些小资产者必然推翻我們的工人政权，像那些正是在这种小私有制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拿破侖之流和卡芬雅克之流推翻了革命一样。問題就是如此。只有藏在关于“劳动”农民的空談后面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才看不到这个简单而明显的真理，但是有誰去認真地对待这些沉醉于空談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呢？

存有几千小款的小资产者是国家資本主义的敌人，他們无疑希望把这几千小款用在自己身上，反对貧民，反对任何全国性的监督，而这几千小款却給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投机活动造成数十亿的基础。假定說，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几天内創造出为数 1 000 的价值。又假定說，在我国，由于小投机活动，由于各种盜窃行为，由于小私有者“逃避”苏維埃的法令和条例，这个总数中的 200 落

了空。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会說：假如我从这 1 000 中拿出 300 来就能建立更好的秩序和組織，那我乐意拿出 300，不是 200，因为在苏維埃政权下，既然秩序和組織会整頓好，既然小私有者对国家各种壟断的破坏会被彻底打破，那末以后减少这种“貢款”，比如說减到 100 或 50，就会是十分容易的任务。

这个简单的数字例子——为了使說明通俗起見，我故意把例子弄得再简单不过了，——說明了現时的国家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工人掌握着国家政权，他們在法律上有最充分的可能把 1 000 統統“拿走”，就是說，不比一个戈比落在非社会主义用途上。这种由于政权实际已轉到工人手中而产生的法律上的可能性，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

但小私有者的和私人資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却用很多办法来破坏法律上的規定，暗中投机，破坏苏維埃法令的执行。国家資本主义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即使（我故意用这样的数字例子，是为了更明显地說明这点）我們付出的代价比現在 还大，为了“領教”是值得破費的，因为这对工人有好处，因为消除混乱状态、經濟破坏和松弛現象是无比重要的，因为繼續小私有者的无政府状态就是最大的、最严重的、绝对会葬送我們（如果我們不战胜它的話）的危險，而付給国家資本主义大宗貢款，不仅不会葬送我們，反会使我們通过这一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一經学会了怎样保卫国家秩序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无政府性，一經学会了怎样根据国家資本主义原則来安排全国性的大生产組織，那时他就会掌握全副工牌，——恕我如此来形容——而社会主义的巩固就有了保证。

国家資本主义 在經濟上 无比地高于我国現时的經濟，这是第一。